

# 三秩归一：电商发展形塑的乡村秩序

## ——菏泽市农村电商的案例分析

邱泽奇

(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

**[摘要]** 和谐的乡村秩序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社会、政府是影响乡村秩序的三股重要力量。文章以一个村庄的电商发展为案例发现，返乡创业人口触发了乡村秩序的重塑：电商为小乡村带来了大市场，大市场推动了乡村的经济生活的重组，建构了一个线上线下开放的经济秩序；经济秩序的变动触动了传统乡村的权威结构，基于传统文化的资历权威依然存在，家业兴旺则让能力权威从传统结构中分离出来并赋予了年轻人，形成了双雄并立的社会秩序；助力和引领乡村电商发展、积极为市场和社会提供政策保障，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让政府服务融入乡村发展的大局之中，扮演组织者角色，重塑了乡村的政治秩序。政治、经济、社会三秩归一，形塑着乡村振兴的大格局。

**[关键词]** 秩序；政府；市场；经济；社会；三秩归一

**[中图分类号]** C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314 (2018) 01-0047-08

DOI:10.14063/j.cnki.1008-9314.20180130.016

###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坚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出“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村现代化”。在实地调研中我们发现，产业兴旺既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抓手，也

是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前提。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是产业兴旺的保障，生活富裕则是乡村振兴的总体呈现。可以说，农村现代化既是乡村发展的目标，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围绕产业兴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有过多种努力，如：发展乡镇企业、发展民营经济、发展现代农业等。在一些地区，这些努力的后果之一是，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乡镇企业竞争失利，农村大量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不得不

张树沁、乔天宇、黄诗曼、罗祎、孙朔晗、李澄一、尚用馨等参加了菏泽市电商发展的调研活动；阿里研究院、菏泽市商务局、牡丹区商务局、定陶区商务局、曹县商务局、鄄城县商务局、鄄城县商务局、东明县商务局、成武县商务局、单县商务局、巨野县商务局等为调研提供了诸多支持，罗祎、苏永忠、黄诗曼、乔天宇对修改提出了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收稿日期]** 2018-01-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作为发展要素的互联网资本研究”(16JJD840002) 成果

**[作者简介]** 邱泽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外出谋生，让乡村的经济生活依赖于外出打工的人口，让乡村的社会生活变成留守老人、儿童、妇女的世界。为解决乡村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各地政府也尝试多种政策和措施，譬如运用财政转移支付方式，送项目下乡、送资金下乡，却因多种原因如缺少实施项目的人才、缺少适用劳动力、难以让留在农村的人口加入其中等，而收效有限。由此，在乡村，社会、经济、政治力量各自有自己的目标，各自沿自己的逻辑运行，“三秩并行”，<sup>[1]</sup>无法形成乡村发展的合力。

我们也发现，另一些地区同样经历了乡镇企业的衰落，却依靠发展电商吸引外出打工人口返乡创业，进行劳动再分工，有效地创造了新的产业或让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产业兴旺。与此同时，外出人口的返乡让曾经残缺的家庭归于完整，使老有所养、幼有所教，人们重归自己的社会角色，家庭和谐，村庄红火。在电商发展中，地方政府关注农户的需要，为他们解决难题、提供指引、提供政策保障，让地方政策与政府行政服务于乡村发展，实现了乡村的有效治理。简言之，乡村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都围绕乡村发展这一目标共同努力、相互支持和协作，形成了经济繁荣、社会有序、政治有为的“三秩归一”乡村秩序，让我们看到了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的景象。

针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文献大多采用“国家—社会”视角，认为在乡村社会存在一种主导力量，要么是国家主导着乡村秩序<sup>[2-5]</sup>；要么沿用“皇权不下县”的想象，认为或主张国家无为、社会自治<sup>[6-8]</sup>。我们在实地调研中的观察表明，国家与社会的确是建构乡村秩序的两股力量，却并非一定是对抗的力量，而可能是不相交的或合作的力量；此外，市场也是影响乡村秩序的重要力量，却曾不被关注，即使关注也更多地被作为是乡村分化而不是整合的力量。<sup>[9]</sup>我们的实地调研则表明，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政府、社会、市场是影响乡村秩序最重要的三股力量，如果不相交，便会形成“三秩并行”的格局；<sup>[10]</sup>如果相互支持与合作，便可能引致“三秩归一”。

本文希望通过山东省菏泽市电商发展的案例分析，探讨政府、社会、市场三股力量如何影响乡村发展，并在其中形塑了怎样的秩序？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体制机制又在以怎样的方式呈现？文章分为六个部分，第二部分对案例做简要介绍，第三部分讨论市场力量建构的经济秩序，第四部分剖析家庭回归呈现的社会秩序，第五部分分析政府服务形成的政治秩序，第六部分对文章的讨论与分析进行归纳。

## 二、案例：菏泽市的电商发展

在2015年的文章中，我们以一个地级市的村庄为例，讨论了“三秩并行”的乡村秩序。<sup>[11]</sup>为了便于比较，这里，我们也将主要以一个村庄为例进行分析和探讨。在中国，一个村庄总是更大的政治、社会与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为理解村庄实践的环境，我们先对菏泽市做一简要介绍。

菏泽市地处鲁西南，人口超过1000万，是山东省人口最多的地级市，也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地级市之一。在高速铁路与高速公路叠加发展的中国交通网络中，菏泽的交通并不方便。从北京直达菏泽的火车需要运行近8小时，即使采用铁路加公路的模式，也至少要花费5小时，还不包括等待的时间。从菏泽到达最近的港口青岛港的时间则需要10小时。

中国多地的发展经验表明，交通是影响物流和人流，进而影响产业兴旺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菏泽市的发展严重受制于交通不便，加上菏泽市深厚农业传统的路径依赖，使其直到如今依然是山东省经济发展水平排名的最后一位。

不过，自2013年以来，借助于农村电子商务，菏泽市的经济发展出现了转机。依据阿里研究院的数据，2013年菏泽市有2个淘宝村<sup>①</sup>，2017年淘宝村的数量激增至168个；网上活跃卖家达到10.8万个；电商园区发展到32个；1395家规模以上企业触网，占规模以上企业总数的43%；跨境电商交易额年增长30%；近3年来，电商交易额每年增长超过60%，2017年前三个季度的电商交易额达1413亿元，比2016年同期增长了70%。

<sup>①</sup> 淘宝村是阿里研究院设置的用于判断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状况的指标，指活跃网店数量达到当地家庭户数10%以上或电子商务年交易额达到1000万元以上的村庄。

乡村的“三秩归一”正是在这样的发展格局中得以形塑起来的。

### 三、市场构建的经济秩序：创新创业，产业兴旺

与曾经讨论过的海梅村一样，丁楼村也是一个普通村庄，2013年以前被淹没在菏泽市众多的村庄之中，名不见经传。在阿里研究院2013年举办的第一届“中国淘宝村高峰论坛”中，丁楼村一举成名，成为菏泽市的两个淘宝村之一，引起了多方注意，变得不再普通。

丁楼村地处菏泽市曹县大集镇。在电商发展之前，除了农牧业和小商业外，村民们的生计几乎没有其他来源。为了谋生，村里的年轻人绝大部分选择了外出打工。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

2010年以前，（村里）没有什么年轻人，连年轻妇女都出去打工了，附近村镇的加工厂招工都招不上。（菏泽访谈：曹县大集镇丁楼村丁培玉 20170706 电商第一人）

2009年，事情出现了转机。村里的葛秀丽到部队探亲期间初学电商技能，回到了丁楼村开了村里的第一家网店，销售影楼服饰。那时，丁楼村生产影楼服饰的屈指可数，葛秀丽卖的产品主要来自邻村一个从乡镇企业年代就开始的产业。

丁楼村民的居住布置为东西走向，葛秀丽家住在村西头，马路在村东头。为发货，她每天必须蹬着三轮车穿村而过。三轮车上装满的货物，引起了村民的好奇，纷纷上门探个究竟。在中国，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sup>[12]</sup>没有可以守住的秘密，葛秀丽开网店的事儿很快便在村里传开了。

第一个跟着学开网店的是葛秀丽的好朋友周爱华。周爱华在工厂上班。在学开网店中周爱华看到了机会，2010年她干脆辞掉工作，回到了村里。接着，做影楼产品销售的丁培玉不再走村串户，开了自己的网店；中专毕业、在外打工的任庆方也返乡开店做起了电商；大学毕业在公司写代码的任安普也返乡创业。电商就这样在丁楼村迅速传播开来。丁楼村的电商丁培玉告诉我们：

2010—2011年那个时候，在我们丁楼村搞电商，搞一家火一家，搞一家就成一家。（乡亲们）也都不

保守，你跟我说，我跟你讲，你怎么开店的，我怎么开店，就是你不会开店，我都可以帮你开店。（菏泽访谈：曹县大集镇丁楼村丁培玉 20170706 电商第一人）

从销售影楼服饰开始，丁楼村的电商从客户反馈中捕捉到了市场对表演服饰的需求。影楼服饰和表演服饰在产品特征上具有相似性，可市场却有很大的差别。影楼服饰的需求量相对较小，即使在网上卖，无论是照相馆还是个人，一个买家通常只会买一套。表演服饰则不同，购买者常会以表演团体为单位购买，市场规模远远大于影楼服饰。于是，丁楼村的电商从影楼服饰销售转向表演服饰的销售和生产，曾经口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纷纷加入表演服饰的销售或生产。就这样，一个新的产业在丁楼村诞生了。

市场需求与产品生产之间的正反馈，<sup>[13]</sup>促进了产业规模的迅速发展。从销售中获得了资金积累的农户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纷纷转向生产；已经有了生产的农户则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建立与销售模式更加一致的生产模式。产业规模的扩大自然让产品之间展开竞争。为获得更加丰厚的利润，部分电商便转向专门产品品类的销售与生产，即“爆款”<sup>①</sup>。如此，在市场规律的驱使下，多品类的销售与生产便顺理成章地转变为专业化的销售与生产。从儿童表演服饰的单个品类到戏曲表演专门服饰，丁楼村表演服饰的销售与生产在短短的三四年内便进入产品细分的专业化阶段。

产品销售与生产的专业化，促进了专业化分工。专业人才开始聚集到丁楼村，家住河南省民权县的张付传先生之前在广州市一家服装加工企业做裁剪主管。由于家中老母亲生病，2016年4月，他辞去了广州的工作回到了家乡。除了照顾母亲，他还来到了丁楼村。先是在一家生产企业里帮工，11月，他便在丁楼村桑万路东租下一个店铺，购买电脑制版和自动拉布机等设备，自己挂牌，经营起了服装制版裁剪的生意。除了制版，设计、印花、裁剪等专业人才和经营活动也正在向丁楼村或大集镇聚集。

<sup>①</sup> “爆款”为电商俗语，即让一个款式的产品卖到足够的数量，成为一个网络销售平台如淘宝的前三名。

2016年之前，丁楼村的电商每年都要花一段时间专门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镇采购布匹，到浙江省义乌市的小商品市场采购辅料和配饰。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专业化，丁楼村对原材料和辅料需求迅速增长。原材料和辅料的生产厂家看到了在丁楼村的市场，采用代理或直营模式在丁楼村开设专营或直营店，甚至非专业市场的厂家也来到了丁楼村开设厂。

图1呈现了丁楼村电商的发展变化。2010年，在240户农户中经营电商的只有6户；在被授予淘宝村的2013年，在272户农户中经营电商的也只有95户；到2014年，在280户农户中经营电商的农户快速增加至210户，在2017年310户农户中经营电商的增加至280户。随着电商经营农户数量的增加，电商经营额也快速增长，2013年只有5000万元，到2017年便增加到4亿元。受丁楼村的影响，电商经营在大集镇、曹县迅速扩散。以大集镇为例，2013年只有丁楼村一个淘宝村，2017年32个村子都变成了淘宝村。从2013年到现在，大集镇吸引了500多名大学生和5600多名外出务工青年返乡创业就业。受菏泽电商发展势头的吸引，近两年来，有7.5万名菏泽籍在外人士返乡创业就业，带动了21.5万人就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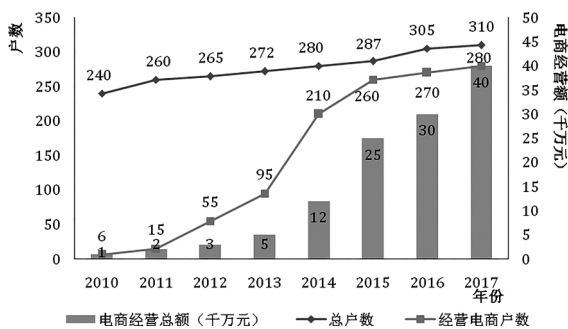


图1 丁楼村电商发展格局

由一根网线连接的丁楼村，不仅形成了表演服饰生产与销售产业，还在形成从原材料辅料供应、产品设计创新到制版、裁剪、生产、销售、运营这样一个十分全面的产业格局，出现了非常专业化的分工协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市场中诞生，也在市场中迭代。市场的主体正是丁楼村的农户。曾经的农民获取市场需求、依据市场需求更新产品、开发新产品、提

升产品竞争力，他们适应差异化市场需求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

市场的崛起彻底地改变了丁楼村、大集镇、曹县乃至菏泽市乡村的经济秩序，促使它们从传统农业向非农产业的创新创业转型，在没有非农产业基础的大集镇形成了销售和生产一体化、相关产业的聚集化、上下游产业生态化；在有产业基础的乡村，正在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在有出口产业基础的乡村，也在推动出口企业的转型和升级。

反观传统小农的乡村，无论是产品市场还是劳动力市场都呈现为内部市场，正如施坚雅和黄宗智曾经论述过的那样，<sup>[14-16]</sup>这其实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市场。而在类似于海梅村的乡村，看起来是一个内部市场，尤其是劳动力市场，但事实上，市场的开放性使得针对内部提供的就业机会因其低收益而失去吸引力，乡村劳动力更愿意通过外出打工来获得更大的收益，由此形成了内外分离的市场秩序。<sup>[17]</sup>

丁楼村电商发展形成的显然是另一种经济秩序。互联网连接的产品市场是一个完全开放市场，与市场规律相悖的经济行为只能被市场淘汰，与市场规律一致的经济行为才会获得市场的青睐与支持。无论是产品市场、销售活动，还是劳动力市场，我们观察到的，无不体现为丁楼村民可以理解并实践着的市场。正是遵循了市场规律，才让丁楼村呈现出产业兴旺的景象。

#### 四、人口返乡的社会秩序：家庭和谐，乡风文明

之所以强调在丁楼村的市场是村民可以理解并实践的市场，是因为人类社会并不存在一个在实践层次普遍适用的市场。任何实践层次的市场规则与行为都嵌入在其社会之中，<sup>[18]</sup>与其所处社会的社会规则相容或一致。

在海梅村，我们观察到宗亲关系是村庄社会秩序的基础，师徒关系、同行团体也是维系村庄共同体的重要力量。<sup>[19]</sup>可是，由于大多数劳动力都外出打工，在节庆之外的时间，村庄的社会秩序是残缺的，是由乡村政府维系着的社会秩序，即代理人秩序。<sup>[20-21]</sup>在丁楼村，其社会秩序曾经也与海梅村一样。

不同的是，随着外出打工人口返乡，随着电商的

发展，丁楼村开始呈现另一种社会秩序。外出打工是中国欠发达乡村的一个普遍现象；外出打工一段时间以后，返乡创业的现象也不只出现在丁楼村；丁楼村的特别之处正是其传统的家庭文化与返乡创业之间形成的社会关系。

菏泽市紧邻孔孟之乡，有着非常深厚的家庭秩序传统。与一些乡村不同的是，人们返乡创业的驱动力不仅在于经济收获，更在于家庭责任的驱使。年轻人在外打工一段时间，子女到了受教育的年龄，父母亲也老了，到了要赡养的年龄。回到家乡创业，既可以为子女接受教育营造一个稳定的家庭环境，也有机会照顾年迈的双亲。

可是，亲情的维系需要经济基础的支撑。运用电商创业的返乡人其实面对众多的困境，其中之一就是创业成本。要想做好电商，既需要独到的产品，更需要周到的服务。无论是产品生产还是电商服务，都需要劳动力。如果父母不参与到子女的创业活动中，子女就得雇人。雇人，既意味着增加成本，也意味着推高失败风险。为了帮助子女创业，父母主动加入产品生产和电商服务之中，形成了一家人都参与电商创业的格局，不仅降低了子女的创业成本，更是在家庭内部形成新兴的代际分工。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新的代际分工还发生在村庄层次。在鄄城县我们观察到，一些企业聘用老弱病残参与他们力所能及的生产活动，形成了“留守员、中老年，一天能挣上百元”的现象。

传统的代际分工是父母向子女传授经验，不仅形成劳动力的数量增量，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秩序中维系了父辈的权威性，让年龄、资历与能力建构的社会秩序方向一致，形成了费孝通说的“长老统治”，<sup>[22]</sup>也是人们对中国乡村传统秩序的最熟悉的想象。

新的代际分工则是子女提供机会，让父母充分施展能力，形成两代人之间能力的互补。如此代际分工形成的社会秩序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秩序，也不同于代理人的社会秩序。在丁楼村的社会秩序中，传统的尊老爱幼秩序形式依然存在，可形式背后的内容却截然不同，父辈的资历依然是其社会权威的来源，可“能力”不再是权威的来源。

资历与能力的分离形成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双

权威”格局。一方面，“资历”，尤其是子女有出息的资历让父辈不仅在家庭获得尊重，在乡村也成为“为人父母者”持家的榜样；另一方面，“能力”，则成为年轻后生获得社会声望的重要途径，不仅在家庭让父辈为之骄傲，在乡村也成为人们争相学习的对象。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任庆方 2010 年回家探亲期间听说村上有人开淘宝店，觉得自己一定会做得更好。他算了一笔账，如果自己全身心地投入，会比在外打工赚得更多，而且还能照顾家人。

于是他回到了丁楼村在网上做起了影楼服饰生意。2012 年，任庆方又凑了 13 万元开办了服饰加工厂，自己生产。2013 年销售额达到 60 万，还开了天猫店；2015 年近 300 万。2014 年他被共青团曹县县委授予“十佳创业青年”称号，共青团菏泽市市委还将其树立为农村电商青年创业典型。（依据《菏泽访谈：曹县大集镇丁楼村任庆方 20170706 电商达人》整理）任庆方的经营模式迅速成为丁楼村电商学习的对象。任庆生就是其中一位。

论年龄，任庆生是同族任庆方的兄长；论经营电商的能力，任庆方则是任庆生请教的对象。可学习不意味着跟随，而是在跟随中创新。在学习中的庆生表演服饰产品不仅在中国销售，也销往新加坡、加拿大、韩国、马来西亚等七八个海外国家。（依据《菏泽访谈：曹县大集镇丁楼村任庆生 20170613 带头人》整理）

如果不仅“能力”好，“德行”也好，后生也能成为乡村社会的“新乡贤”，任庆生便是典型的例子。

在丁楼村，任庆生自己电商做得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更像是个“乡贤”，把自己经营电商的经验教训对村民们倾囊相授。2010—2017 年，丁楼村经营电商的农户从几户发展为 280 多户，占村家庭户数的 90% 以上。2014 年，任庆生被推选为丁楼村村支部书记。（依据《菏泽访谈：曹县大集镇丁楼村任庆生 20170613 带头人》整理）

因电商技术应用产生新代际分工带来的乡村社会秩序，既延续了中国文化中老有所养、幼有所教的传统，又演化出用贤举能的新风尚，形成了资历与能力

双力驱动的社会秩序，不仅让家庭和谐，也推动着乡风文明的发展。这一发展的具体呈现是，丁楼村没有了犯罪，乡亲之间没有了争吵，城市里的广场舞也出现在了农户的家门前。

## 五、政府润泽的政治秩序： 助推引领，治理有效

第三、四两节的讨论似乎在说明乡村是一个自我组织、自我运行的地域共同体。事实上，不是！中国是一个有着近 3000 年行政管理体制的国家，即使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看起来是人群自治共同体，实际上却是国家权力无处不在的地域行政共同体。只是，国家权力在村庄层次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

在传统的中国乡村，除了皇权下达，还有民意上传，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居住在乡村，却与乡村利益有着一定距离的乡绅实现的，即费孝通讨论的“双轨政治”。<sup>[23]</sup>进入近代以来，国家权力逐步下达到村庄，却不在村庄设置政府机构，而是运用村庄代理人上传下达。<sup>[24-25]</sup>在海梅村我们观察到，其政治秩序有着明显的自立性，乡土专家评定项目系政府设计，也从科层化的官僚系统内部展开，村民只是作为评定的对象，评定工作则由村干部负责落实。村级干部有着鲜明的代理人特征，评定的结果对村民的社会经济生活也没有实质影响，进而形成了双轨政治的变形，即乡村政治秩序的上下分治和有形无实。<sup>[26]</sup>

在丁楼村我们则观察到了另一种乡村政治秩序。地方政府并不独立设计财政转移支付下乡的项目或计划，而是顺应农户发展电商的需要，在农户无力应对的领域和环节施展政府能力，服务和引领乡村发展。

网络是电商发展的基础设施，也是村民无力企及的领域。为服务电商发展，地方政府积极利用财政转移支付资源进行网络建设。以大集镇为例，2013 年 4 月，镇政府利用山东省光网改造试点，联合菏泽市联通公司曹县分公司，在乡村进行光网改造。2013—2016 年间，大集镇的光纤入户数与网点数一直稳步增加，接入互联网的平均增长率达 114%，光纤入户数增长率达 129%。截止到 2016 年，大集全镇已有

5800 多户实现了光纤入户，各行政村已实现了光网全覆盖。

场地是电商发展的又一必要条件，也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关键环节。通常的情境是，随着销售的发展，村民不仅需要场地暂存产品，也需要场地进行生产。为解决场地问题，村民们能做的是在房前屋后搭建临时空间。政府则可以利用政策资源兴建地方性的产业园。

还是以大集镇为例。在注意到场地难题后，镇政府从 2013 年开始，一方面协调各方资源，或改造和利用村镇废弃、闲置的厂房、废旧庭院，或兴建表演服饰加工厂。另一方面，为发挥产业集群效应，开展电商产业园的建设。大集镇淘宝产业园总投资 2.6 亿元，一期占地 120 亩，布局上采用前店后厂模式，以生产、加工淘宝表演服装为主，集网络销售、产品展示、物流运输于一体，一期工程已全部投入运营，状态良好，年销售收入达 10 亿元，带动直接就业 3000 余人。产业园二期建设已启动，建成后，将成为中国最大的表演服饰加工销售集聚区。2016 年，其被列为山东省重点发展项目。

技能习得是乡村发展中的又一难题。我们知道乡村熟人社会的特征有利于简单技能的扩散与传播，可电商是有门槛的经营活动，赋能便成为发展电商的瓶颈之一。为此，地方政府或运用榜样的力量，树立各种百姓身边的榜样，邀请他们现身说法，道出各自的经营经验；或建立村级电商服务站，开展现场咨询服务，对村民展开一对一帮扶活动，丁楼村的任庆方、任庆生、丁培玉等都是典型的例子。

培训是村民无力组织的又一领域。菏泽市各级政府积极响应村民的需求，组织各类资源，展开各种形式的培训，仅 2016 年，菏泽市举办的各类电商培训多达 634 余场次，平均一天有 2 场次，参加培训的达 9 万多人次。

除此以外，电商发展的中间环节也有政府的无形支持。还是以丁楼村为例。在销售和生產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进行企业注册、进而使企业的各项权益得到保障是丁楼村大多数电商曾经遇到的一个环节。传统的企业注册不仅手续烦琐，涉及多个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更让村民摸不着头脑。为此，政府要求工商部门与公安消防、税务、金融等多部门协调，为电商创

业企业搞一站式服务。2013年，大集镇党委政府专门发文，为企业注册提供优惠政策，凡需注册有限公司的，所需办理的一切证件和手续均由政府出资，派专人协助和负责办理；并专设淘宝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对电商和加工企业实行归口管理，除公安消防安全检查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该小组批准，不得向电商企业及网店乱检查、乱收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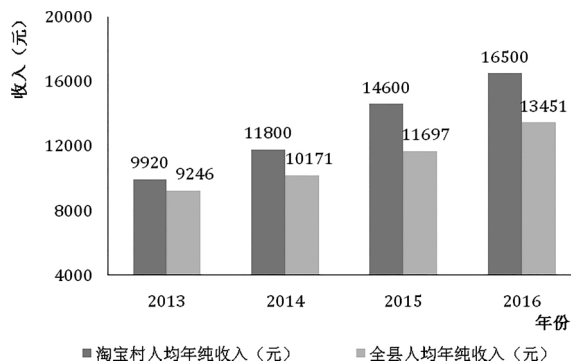


图2 曹县人均纯收入与淘宝村人均年纯收入 (2013-2016)

在丁楼村和菏泽市各区县的调研中我们发现，为发展电商，政府提供的各项直接和间接的服务，以及引导、推动、整合政策，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不过，这个清单无一例外地说明，有效的乡村政治秩序不是在权力斗争中争取的，更不是在对社会和市场的管束中强化的，而是在积极回应百姓发展的需求中而获得的，也通过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得到巩固和强化。

其中，农民收入的增加是百姓支持政府的基础。以曹县为例，图2表明，2013年以来，淘宝村的人均纯收入始终高于全县的人均纯收入；与此同时，全县的人均纯收入也在快速增长之中。

丁楼村的例子说明，政府服务于发展不仅是村民的需要，也是地方政府治理的抓手，推动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是积极润泽地方政治秩序的有效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基层政治秩序的发展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境。20世纪80到90年代，基层政府为了经济发展也积极服务于乡镇企业，被称之为政府对企业的“庇护”；<sup>[27]</sup>由于乡镇企业在许多地方事实上是乡镇政府所有的企业，有学者认为地

方政府就是企业。<sup>[28-29]</sup>不过，与乡镇企业年代不同的是，当年，地方政府与乡镇企业之间的确有许多扯不清的关系，无论是在产权上还是在收益分配上，两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如今，在丁楼村，基层政府与企业之间没有任何经济利益的纠缠。如果一定说两者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那就是都希望通过产业兴旺促进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

丁楼村的政治秩序也可以被看作是“双轨政治”的另一种变形。与海梅村的上下分治和有形无实不同，丁楼村的政治秩序既贯彻了振兴乡村的国家政策，也上传了百姓在追求美好生活中对政府服务的需求，且得到了基层政府积极反馈。政府与百姓之间形成了一种直接的网络互动，我们姑且称之为“助推引领”。

## 六、结 论

中国过去近40年的经历说明，社会、市场、政府是影响乡村秩序的三股重要力量，围绕“发展目标，三者的认知不同、行为不同就会塑造不同的乡村秩序。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围绕乡村振兴，让三者形成合力，则是推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解决不平衡发展和不充分发展的必由之路。

菏泽市曹县丁楼村的例子说明，围绕农村电商发展呈现的乡村秩序是一类迈向乡村振兴的协奏曲。

在过去100多年里，中国的确在从传统走向现代，可是中国的家庭文化依然存在，尤其是在欠发达地区。家庭文化让在外打工多年的青壮年劳动力返回家乡，上赡长辈，下育子孙，把多年积累的劳动技能带回家乡创新创业，触发了乡村秩序的另一种新格局。

由一个人带回的电商，在实践中迅速成为人们模仿的对象。乡土熟人社会之间的无秘文化，为相互之间的模仿提供了正当性。模仿中的创新成为推动产业的动力，模仿中的竞争又让专业化成为必然。专业化进一步带动着产业聚集和生态化。由此，形成了一个高度市场化的丁楼村新经济秩序。

之所以强调丁楼村，是因为这个秩序嵌在乡村的社会文化之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家庭文化。中国是一个家庭主义的社会，中国人认为，人生的最大价值在于“子女有出息”。<sup>[30]</sup>子女有出息的指标不在于传宗接代，而在于光宗耀祖；光宗耀祖的指标之一就是家业兴旺。因此，发展是家庭的共同目标。尽管劳动力返乡的动力来自于赡老育小，实现返乡目标的支撑还是来自于家庭的经济条件。如此，在长辈依然拥有资历权威的同时，年青一代凭借其为家业兴旺做出的贡献而获得了能力上的权威性，进而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传统乡村的新社会秩序。

杨开道先生曾经认为，中国农村发展最大的问题在于农民的组织。<sup>[31]</sup>如何把农民组织起来成为千百年来中国行政发展始终的议题。在丁楼村案例中我们观察到，基层政府顺应电商发展的需要，不仅为电商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运用行政资源补足村民能力的短板、及时响应村民对政府服务的呼声；也主动发现电商发展对公共产品的需要，助力电商发展，引领电商发展，形成了一个顺应地区发展的新政治秩序。

在菏泽市的电商发展中，丁楼村是众多乡村的一个例子，也是典型的例子。无论是在没有产业基础的还是在有产业基础的乡村，我们都能观察到，围绕产业兴旺形成了目标一致的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三秩归一，这个“一”正是乡村振兴！

当然，电商下乡带来的影响远不止“三秩归一”，譬如对村民思想意识的影响、生活方式的影响等，不过，这些内容超出了本文的主题，当另题讨论。

### 【参 考 文 献】

[1] [10] [11] [17] [19] [26] 邱泽奇, 邵敬. 乡村社会秩序的新格局: 三秩并行——以某地“乡土人才职称评定”为例 [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5 (5).

[2] [20] [24] 杜赞奇. 文化, 权力与国家 [M]. 王福明, 译. 南

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3] 黄宗智. 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 [M]. 上海: 上海书店, 2001.

[4] 黄宗智. 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 [M]. 上海: 上海书店, 2003.

[5] 张仲礼. 中国绅士 [M]. 李荣昌, 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

[6] 湖南省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 稳定农村社会秩序的有效途径——关于石门县太平街区实行“四长”责任制的调查 [J]. 社会, 1991 (1).

[7] 谭同学. 流动人口与半封闭型村庄的秩序整合——以湖南清塘村为个案 [J]. 社会, 2003 (8).

[8] 杨善华, 赵力涛. 中国农村社会转型中社区秩序的重建: 制度背景下的“农户—社区”互动结构考察 [J]. 社会学研究, 1996 (5).

[9] Nee, Victor. 1996. "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 Changing Mechanisms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4).

[12] [22] [23] 费孝通. 乡土中国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

[13] 威廉姆·戴维德. 过度互联: 互联网的奇迹与威胁 [M]. 李利军,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

[14] 施坚雅.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 [M]. 史建云, 徐秀丽,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15] 黄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16] 黄宗智.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18] 马克·格兰诺维特. 镶嵌: 社会网与经济行动 [M]. 罗家德,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21] [25] 李祖佩. “新代理人”: 项目进村中的村治主体研究 [J]. 社会, 2016, 36 (3).

[27] Walder, Andrew. 1986.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M]. 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8] Oi, Jean. 1985. "Communism and Clientism: Rural Politics in China." [J]. *World Politics* 37 (2).

[29] Oi, Jean. 1989.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30] 邱泽奇. 中国人为谁而奋斗 [A]. 包智明. 社会学名家讲坛 [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31] 杨开道. 农村组织 [M]. 上海: 世界书局, 1930.

责任编辑 葛 卫



### Adhering to the Authority of the Central Party Committee and unified leadership

*Ma Xuejun*

**Abstract:** Adhering to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nd unified leadership is the essential attribute of the Marxism political party. It is, as an excellent tradition and unique advantage, formed in our party's long-term practice, and is also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to develop a socialist 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i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to promote the party and state in new era. Guided by the spiri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e hold strong belief in the unity of governance, the well-structured organization system, the consistency of the activity, the consciousness of discipline, and the solid position on maintaining the core. We must strengthen the Party's central authority and the unified leadership that is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new era's Chinese grand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in Xin Jiang.

**Key Words:**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Adhering to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nd Unified Leadership.

###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Peasants' under the Strateg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en Tiejun, Liu Yahui & Zhang Zhen*

**Abstract:** Under the context of 'three Capitals' taking the first position in the world, beef up the villages cannot stick to the old track of industrial capital period. Therefore, in order to emphasize 'understand agriculture, love rural areas and peasants' mentioned in the 19<sup>th</sup> CPC National Congress, we have to understand fully the plethora crisis of all the capitals in the world and the relevance of establishing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trategy. In this article, we point out that the new carrier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merging of city and village and promote the socialization of ecological farming and environmental villages.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lethora of Capital,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 How e-commerce Reshap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Actors in Rural Society: a New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Triangle Perspective

*Qiu Zeqi*

**Abstract:** A harmonized countryside is a part of the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China. Market, society, and local government are three major actors in shaping the harmonization. How e-commerce triggers the actors action in countryside and what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orders being shaped are pursued of this article. A comprehensive fieldwork

shows: (1) E-commerce connected a small village to a networked market, that promotes re-organizing economic elements, therefore industrialization and clustering, then a new economy with online sales and offline production. (2) New labor division in a family broke the authority structure in rural society, i. e. seniority and tacit knowledge based. Seniority is still in its position by confusions tradition, while e-commerce skills became another dimension for authority, which push youth to be authority in economy. (3) Government in rural region used to be a major in patronized relationship or an entrepreneur, but now a public goods provider in e-commerce development. Three actors now have the same goal and join together in the rural e-commerce, which shapes the harmonization in countryside.

**Key Words:** E-Commerce, Harmonized Order, Local Government, Market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 Agricultural Land Survival and Continuity Governance in the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an Analysis Framework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Zeng Shengcong*

**Abstract:** In China, agricultural land survival and continuity is one of public goods or public services which should be provided by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especially local governments. It also reflects the function of government to obviate land capitalization negative externality. Whether the real pressure of agricultural land survival and continuity brings by urbanization or current predicament of agricultural land survival and continuity governance, it reflects weaknesses and omissions of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especially local governments in institutional supply, policy supply, finance supply and governance level. As top-level design, rural vitalization further strengthens the nature of basic public goods of agricultural land survival and continuity. Agricultural land survival and continuity governance should return to the fundamental of government publicity function, improve incentive and constraint mechanisms of "political championship" rather than "economical championship", and base on the requirement of improving weak links of supply-side reform, perfect the system, finance and resource supply, promote thoughts and methods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survival and continuity governance.

**Key Words:**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Agricultural Land Survival and Continuity, Government Governance, Government Functions, Negative Externality

### Several Thoughts on the Poverty Issue after 2020

*Li Xiaoyun & Xu Hanze*

**Abstract:** As a result of the low efficiency of social security,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and the dynamic adjustment of the poverty line under the existing standard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does not mean the end of poverty by 2020.